

【中共党史研究】

1928—1929年中共在日本的组织及活动

——以日方档案资料为中心的历史考察

孙 波

【摘 要】1927年国共分裂后,中共在日本的组织及活动遭到破坏。1928—1929年是中共的在日组织重建和发展时期。在东京的支部遭受重创后,中共在大阪重新进行了党员登记,对党员及地方支部进行重新整编。通过诸多形式,在中国留日学生、华人华侨中间积极宣传共产主义思想,播撒革命火种,大力发展党员。中共党员经过多方努力重新开展地方支部工作,领导和建立了一批社会科学研究性的社团组织,通过散发宣传物品、创办机关刊物等方式开展马克思主义研究,宣扬革命思想。中国共产党日本特别支部与日本共产党也存在某种联系。1929年10月3日,日本政府在全国各地同时行动,逮捕了大批中共党员及留日学生,中国共产党日本特别支部再次遭受严重破坏。

【关键词】中国共产党;日本特别支部;支部建设;党员发展;日本共产党

【作者简介】孙波,南京大学历史学院博士研究生、安徽工程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南京 210023)。

【原文出处】《史林》(沪),2021.5.110~131

【基金项目】本文为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黑龙会与日本侵华战争关系研究(1901—1945)”(项目号:20CZS048)阶段性成果。

1921年4月19日,施存统、周佛海在日本发起成立“中共旅日共产主义小组”,主要任务是壮大党组织力量、开展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以及加强同日本社会主义者的联系,发挥连接共产国际与日本共产主义运动的桥梁作用。^①此后,王步文、童长荣先后负责领导中国共产党在日本的组织及活动,团结广大中国留日学生和华侨,积极推进共产主义的宣传教育工作。^②1920年代初,中共在中国留日学生中秘密发展党员。1927年国共分裂后,中共在日本的组织及活动遭到破坏。1928—1929年间,在王哲明、古杰、房斌、崔仲远、廖体仁、余炳文、叶英群等党员干部的带领下,大批党员积极开展党组织、地方党支部的重建工作,发展壮大党员队伍,发行党的机关报刊,领导和建立了一批党的外围组织,并于1929年7月经中共中央许可正式冠名为“中国共产党日本特别支部”,成为中国共产党在海外的一支重要力量。

目前中日学术界对中共在日本的组织及活动的

研究集中在“东京事件”及中日政府之间的外交交涉,^③从东京左联的角度考察中国留日学生的文艺运动及中国共产党日本特别支部的部分活动史实,^④或从国民党东京支部斗争的角度出发总结国共在日本的合作过程。^⑤国内有关中共东京支部的详细考证则主要集中于1930年代以后,但其中“中共东京支部”的真实指向也有待商榷;^⑥此外,也有学者考察施存统与早期中国共产党成立的关系。^⑦对1928—1929年中共在日本的组织机构、党员发展及支部活动等方面的系统考察尚付阙如。1927年“四一二”及“七一五”反革命政变后,中共在日本的组织遭受重创后是如何重建的?支部的重新恢复及支部工作的开展情况是怎样的?党员发展方面又有哪些特点?中共在日本领导的外围组织有哪些以及如何处理与日共的关系?这些都是亟待深入探讨的问题。本文以日本亚洲历史资料中心藏《中国共产党员检举关系资料》(第一~第七卷)、日本参谋本部依据司法部预审调查

结果编纂《支那共产党运动史》^⑧以及外务省情报部编《赤色支那志》《支那共产党史》^⑨等为史料依据,在日本档案资料的基础之上,考察中共1928-1929年在日本的组织建设及活动的开展过程,厘清中共在日本活动并遭日本政府镇压的历史事实,从侧面揭示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革命的必然性。

一、整合与重构:国共分裂后中共在日组织的重建

1926年前后,日本的学生中间兴起研究社会主义的热潮。在日本各大高校,学生们自发组织社会科学研究会,展开马克思主义研究。在这种氛围之下,中国留日学生也纷纷开始组织社会科学研究会,研究马列主义学说、共产主义思想,暗自同中国共产党在日本的组织联络,寻找机会加入党组织或奉党的指示从事外围活动。

中国共产党在日本的组织——中国共产党日本特别支部,最初的称呼为“党”“市委”“特委”或“日本特委执行委员会”等,^⑩是一个秘密组织。根据日本参谋本部的调查报告,1926至1927年间,留日学生郑畴等与中国共产党取得联系,为了完成革命任务,发展了部分党员,早期有党员十余人。^⑪根据日藏审讯笔录记载,1929年3月李亚农入党时,中国共产党在日本的组织名称为中国共产党日本特别市党部,主要由投身中国革命的留日学生组成,为中国共产党党的一个分支。而且因中国共产党的无产阶级政党性质,当时中国共产党日本特别市党部及每个下属支部均配有一名无产阶级出身的党员。^⑫中国共产党日本特别市党部制定的革命目标、提出的口号与中国共产党是完全一致的。其革命活动主要围绕留日学生、华人华侨开展,支部党员的任务是深入左倾组织及中间组织、同窗会及同乡会指导工作,例如联系日本各地社会科学研究会及东京的艺联、人社、时代工程社、京都的留学生总会、帝大同窗会等。^⑬

1927年国民党接连发动“四一二”“七一五”反革命政变,大肆屠杀共产党员,武装镇压革命群众。日本政府为防止赤色革命,在国内大举整肃和打压日本共产党及其活动,致使中共与日共的秘密联系难以维系,中共在日本的活动被迫转入地下。在国民党和日本政府的双重打压之下,中国共产党在日本

的组织受到强烈冲击。

“四一二”政变以后,国民党右派雇佣反共势力打压左派和中国共产党日本特别市党部,并向日本警察告发中共党员,迫使中共无法继续在东京开展活动。中共设于东京的总支部决定迁往大阪。抵达大阪之后,中国共产党组织成立大阪总支部。大阪总支部的活动在“七一五”之后就被迫中止,仅持续了三个月左右。在大阪,大阪总支部对党员进行了重新登记,将原先隶属于总支部的东京支部、京都支部、大阪支部、横滨支部、神户支部、长崎支部合编为大阪支部、京都支部。总支委何兆芳、张天放、黄新英、袁文彰协助成立大阪支部并指导支部活动,继续坚持三大政策。京都支部由李初梨、廖体仁(1927年4月入党)、于清伦(1927年3月入党)协助开展工作。

大阪总支部活动中止后,中国共产党日本特别市党部又转战东京继续开展活动。1928年8月下旬,中国共产党日本特别市党部在东京市外大冈山召开第一次大会,提出“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反对留学生监督处压迫留学生”“反对土地私有”的口号,发展40余名党员。大会明确了党的工作任务是向广大留日学生宣传中国共产党的宗旨,在留日学生中间散发宣传单、小册子,传播革命火种,使留日学生受到启迪,待其学成回国后,投身国内的共产主义启蒙运动。^⑭中国共产党日本特别市党部面向党员发行机关刊物《学校生活》,使党员了解大会情况及决议事项,统一党员的共产主义思想;^⑮并计划于1928年12月中旬暨广州暴动一周年之际,实施具体革命活动。^⑯第一次大会结束后不久,中国共产党日本特别市党部紧接着召开了第二、三次大会,讨论有关政治局势的报告,审议各地方支部的政治报告及党的工作报告,研究下一步工作及活动方针。在第三次大会上,党员代表们积极开展政治讨论,决心严守党的纪律,秘密同国内党组织联络,将会议情况报告中共中央。此外,大会要求每个党员要发挥各自所长,同日本左翼团体展开联络,同时必须统一按照党的指示与日本共产党进行接触。^⑰

中国共产党日本特别市党部设执行委员会,在执行委员会之下,设书记局、组织部和宣传部;书记局下设秘书处,秘书处联系各地方支部。书记局负

责召集执行委员会及常务委员会开会及同中国共产党的联络任务,统筹管理党内一般性事务;组织部负责各地方支部的组织、党员的入党手续、党费的征收及同各地方支部之间的联系;宣传部负责宣传材料的搜集、宣传物品的制作以及发表等;秘书处负责保存党的记录,撰写执行委员会及常务委员会的会议记录、面向地方支部的通告及宣传物品的发放等。另外,设无职务一职,主要负责指导党的外围组织——中华留日社会科学研究会,及时向党组织汇报该会相关情况及动向。^⑩1928年10月下旬,中国共产党日本特别市党部在东京府北丰岛郡高田町杂司谷史谦处召开会议。会议选举常务委员郑畴任书记,廖以仁负责宣传工作,史谦负责组织工作。1929年3月,李亚农因出席中华留日学生社会科学研究会总联盟代表大会,赴东京滞留数日,其间在东京九段坂(位于今东京千代田区)由廖体仁介绍入党,后加入京都支部。根据他的供词,至少在1929年3月前后,中国共产党在日本的组织架构如图1所示,组织名称尚为“中国共产党日本特别市党部”。

中国共产党日本特别市党部组织架构的最高一级是支部代表大会,为中国共产党在日本组织的政策决策机构和最高领导机关。在支部代表大会之下,设立市委员会,受支部代表大会领导。市委员会下辖神户、仙台、京都、东京四大支部,其中,东京支部又由四个支部组成。中国共产党日本特别市市委一级设书记一名,由宣传委员会(委员若干名)和印刷委员会(委员若干名)组成。^⑪

“四一二”以后,就中国共产党日本特别市党部的存续问题,当时党员内部也存在分歧。一部分党员认为中国共产党日本特别市党部的存在不合法理,理由是共产主义者是不分地域、种族的,共产党不是一个民族性组织,而是一个地域性组织,应当是同一地域内生活的马克思主义者共同的组织,特别是廖体仁声称日共领导人和中共领导人在莫斯科会面讨论将中国共产党日本特别市党部与日共合并。然而“四一六”事件以后,日本共产党受到毁灭性打击,组织机构几近瓦解。中国共产党日本特别市党部与日共合并一说也就不了了之。

1928年至1929年期间,中国共产党日本特别支部的基层党组织、地方支部开始重建。到1929年9月,中国共产党日本特别支部的地方支部数量已经从1929年3月末的7个发展至20个。^⑫

1929年4月初,在东京府丰多摩郡杉并町阿左谷陈启宇处,中国共产党日本特别市党部召开第二次代表大会,^⑬有十余名党员出席。大会制定的阶段任务是尽可能与正式党员取得联系、严守党的纪律、加强党员之间的联系。大会选举产生了执行委员会和常务执行委员会,一致决议通过散发传单、发行机关报持续扩大党的影响力。^⑭大会同时选举执行委员李味五、廖以仁、王哲明、古杰、房斌、崔浚、陈曼云、廖体仁、余炳文、叶英群为常务委员,李味五任书记,廖以仁任秘书,由王哲明负责组织工作,古杰负责宣传工作,房斌任无职务。^⑮5月中旬,在丰多摩郡杉并町马桥郑长群^⑯处,中国共产党日本特别市党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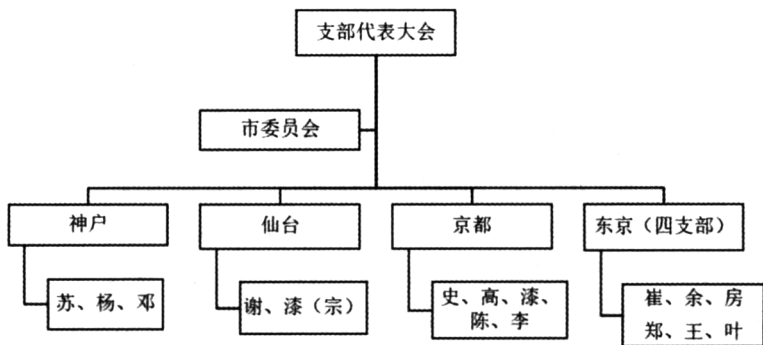


图1 中国共产党日本特别市党部组织架构图

图片说明:JACAR(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Ref.B04013027700(第34画像目)、各国共産党関係雑件/中国ノ部/中国共産党員
検挙関係第一巻分割4(1-4-5-2-1_1_2_001)(外務省外交史料館)。

召开执行委员会议,进行了干部改选。会议选举廖体仁任书记,李味五任秘书,由叶英群负责组织工作,王哲明负责宣传工作,房斌任无职务。

据李亚农供述,1929年5月中旬至7月10日之间,京都支部指派他在东京执行任务。在此期间,他参加了七八次中国共产党日本特别市党部的内部会议,会议地点在东京市东中野叶(仲豪)家中,每次约十一二名党员参加,主要有余炳文、漆宗兴、郑道之、谢(位鼎)、叶(仲豪)等人。内部会议集中进行政治时局分析及支部建设问题讨论,并决定开展“中东铁路事件”“海军军费缩减问题”“编选会议”“劳工赔偿案”“中国黄色工会问题”“托洛斯基主义问题”等相关宣传,印制、散发宣传品,反对帝国主义战争,并设法接近非党人士,以谈话方式向其宣扬革命思想、介绍革命活动的具体情况。此外,中国共产党日本特别市党部成立了专门负责指导宣传工作的宣传委员会,由郑道之担任宣传委员长,李亚农等担任宣传委员。

7月中旬,在东京府下洗足池附近郑长群的另一居住地点,中国共产党日本特别市党部召开了第三次代表大会。^⑤大会选举了由古杰、叶英群、郑道之、王哲明、廖以仁、钟文、崔浚(仲远)、史怀文、冯骥、李味五(候补)、廖体仁(候补)、陈曼云(候补)组成的执行委员会。古杰、郑道之、叶英群担任常务委员,选举古杰任书记,叶英群负责组织工作,郑道之负责宣传工作,冯骥负责秘书处工作。^⑥大会通过决议,进一步加强同中国共产党的联络,并继续保持与日本共产党及日本左翼组织的联络,将党组织名称确立为“中国共产党日本特别支部”,上报中共中央批准。接到通报后,中共中央作出指示,立即中止执行“继续保持与日本共产党及日本左翼组织的联络”的决议,认为此时同日共及左翼组织联络存在风险。^⑦经中共中央审批,日本特别市党部五十余名同志被认定为正式党员,并正式启用“中国共产党日本特别支部”这一名称。^⑧中国共产党日本特别支部向国内的上级党组织汇报党员及支部在日本的活动情况,并依据中国共产党对当时中国政治情势的报告在日本继续进行革命活动,借助国内寄往日本的中国共产党机关刊物《布尔塞维克》《红旗》《列宁青年》等展开

宣传工作。^⑨

中国共产党日本特别支部是被中国共产党认可的海外支部。^⑩当时,掌握实权的古杰(广东)与王哲明(上海)之间,因为组织问题发生冲突,古杰暑假回国,指派廖以仁向其汇报日本特别支部的状况。中国共产党上海市党部特别负责人、上海人道互济会干事王佑平派梅电龙赴日解决中国共产党日本特别支部干部内部之间的纠纷问题,^⑪向日本共产党中央党部转告日本共产党干部佐野学在上海被捕的消息,交付日共活动经费及革命运动牺牲者遗属慰问金两千元。^⑫

7月,中国共产党日本特别支部召开常务执行委员会议,决议于同月下旬成立由在日中国留学生左倾组织中华留日社会科学研究会、时代工程社、艺术联盟及人社联合组成的中华留日反帝同盟,目的是反对帝国主义战争,并借此机会秘密在中国留日学生中宣传打倒中国国民党,宣扬共产主义思想,壮大中华留日反帝同盟的规模。^⑬

随着反帝同盟的规模持续扩大,中国共产党日本特别支部于9月1日组织敢死队,在中华民国驻日大使馆抗议示威,要求返还中东铁路,甚至策划火烧大使馆。示威运动临近,因部分中层党员干部的身份暴露,计划以失败告终。其余党员干部又组织“九四”银座示威游行。9月4日游行活动时,日本警察在银座松屋吴服店附近拘捕了数十名中共党员及相关人员,而大部分运动的核心领导成员潜逃。10月3日清晨,日本展开全国集体逮捕中国共产党员行动,以期将日本的中国共产党员一网打尽。^⑭这就是中共党史卷帙上的“东京事件”。

二、虚实有度:中共在日本发展党员的多重程式

1929年10月“东京事件”发生以后,中华民国驻日大使馆与日本外务省交涉,希冀日方提供拘捕中国留学生的确切名单及人数。1929年11月27日,日本外务事务官木下通告中方,截至11月26日,日本方面累计拘捕中国共产党日本特别支部相关人员225人,其中仅10月3日当天就拘捕130人,东京警视厅监狱收监148人。日本检察机关累计释放人数130名,在押人数为95人,其中关押在东京警视厅监狱^⑮内83人。至1930年2月为止,被日方核实认定并

登记在《中国共产党员名簿》内的中国共产党员达66名。^⑤日本各地方知事联合警视厅、地方法院对中国共产党员以及疑似中国共产党员的相关人员展开司法程序上的调查、取证及审讯,并将审理结果通告内务省、外务省、司法省,陆续分批次将“犯罪”情节较轻者强制驱逐出境。5月底,仍有36名党员尚被收押在监。

1930年5月6日,中华民国驻日公使汪荣宝致函日本外务大臣币原喜重郎,以各省教育厅发放或停止留日学生官费问题为由,要求日方提供羁押于市谷监狱及其他县监狱的36名学生的姓名及所属学校名单。^⑥5月30日币原喜重郎向中国临时代理公使江某复函时,随函附带提供了这份36人的《中国共产事件被告人氏名》名单。^⑦

表 1 日本监狱收押中国共产党日本特别支部党员名单

被告姓名	籍贯	学校	时年	经历	介绍人	备考
廖体仁	湖北省黄梅县廖家圩	东京帝国大学大学院研究生	32岁	1918年9月赴日1928年4月入党	于清伦	
史殿昭	安徽省宣城县奉公街	京都帝国大学土木工学科在读	27岁	1921年3月赴日1928年12月入党	廖体仁	
聂馥绪	湖北省武昌望门广里堤三九号	成城学校预备科在读	21岁	1928年8月赴日1929年5月入党	李味五	
叶英群	安徽省桐城县陶冲驿	中央大学经济科在读	23岁	1928年10月赴日1929年3月入党	廖以仁史谦	停止执行
房斌	安徽省桐城县朱窠村	东京工科大学二年级在读	23岁	1926年9月赴日1928年9月入党	廖以仁	
王明哲	江苏省上海市西门蓬莱路普育里三三号	法政大学经济学部二年级在读	23岁	1927年8月赴日1928年9月入党	郑畴	
朱大鼎	安徽省无为县城内	北海道帝国大学农学部林学科实科毕业	21岁	1925年9月赴日1929年3月入党	李士瘦	
郑柏	广东省琼山县演丰市山尾村	成城学校预科中退	25岁	1929年3月赴日1929年4月入党	古杰	拘留中
周其湛	河南省信阳县柳林村	北海道帝国大学农学部林学科实科毕业	25岁	1925年12月赴日1929年5月入党	李士瘦	
林云青	奉天省西丰县大十字街	东亚高等预备学校一年级在读	21岁	1929年4月赴日1929年8月入党		免诉
吴福和	安徽省桐城县	东京铁道局教习所专门部毕业	24岁	1925年9月赴日1929年1月入党	史谦	
余炳文	四川省威远县	东京帝国大学农学部农业经济科二年级在读	26岁	1921年9月赴日1929年2月入党	漆相卫	
黄维聪	广东省中山县	成城学校高等军政科在读	21岁	1928年2月赴日1929年6月入党	许崇春	
刘之汇	云南省易门县城内	东京高等师范学校特设预科在读	20岁	1926年9月赴日1929年4月入党	郑道之	
宋建鹏	奉天省开原城内	明治大学经济专业在读	26岁	1928年3月赴日1929年2月入党	崔浚	
李味五	陕西省华县西大街	法政大学经济专业在读	26岁	1928年1月赴日1928年10月入党	王明哲	
左鸿暄	四川省三台县太和镇	明治大学专门部政治经济科二年级在读	24岁	1929年2月赴日1929年3月入党	杨玉珊 冯涧章	
古公尧	广东省梅县	成城学校补习科在读	21岁	1928年11月赴日1929年7月入党	冯曼曼	
杨若僧	广西省南宁市学前街三七号	日本大学专门部经济科在读	22岁	1922年9月赴日1929年5月入党	李味五 王哲明	
郑道之	广东省陆丰县城	庆应大学经济学部三年级在读	27岁	1927年3月赴日1929年4月入党	郑畴	停止执行
刘光源	湖北省大冶县	明治大学政法经济科在读	25岁	1928年3月赴日1929年9月入党	郑畴	

(续表 1)

被告姓名	籍贯	学校	时年	经历	介绍人	备考
刘凤冈	湖北省沔阳县刘家村	明治大学政治经济学部本科一年级在读	19岁	1926年9月赴日 1928年6月入党	王焕章	
史怀文	安徽省桐城县安凤岭	东京高等工学校应用化学科毕业	25岁	1929年4月赴日 1928年6月入党	钱某	
姚岸	广东省文昌县第九区	东亚高等预备学校在读	24岁	1926年9月赴日 1929年5月入党	郑柏	拘留中
郑长群	广东省汕头市崎碌	京都帝国大学法学部在读	26岁	1927年12月赴日 1929年5月入党	郑道之	
冯骥	广东省琼山县府城	第一外国语学校俄语科在读	23岁	1928年10月赴日 1928年6月入党	郑汉先	
詹开进	广东省琼州大昌县烟墩市昌郎村	第一外国语学校在读中	23岁	1925年10月赴日 1928年12月入党	郑畴	
李士瘦	安徽省桐城县棕阳镇	北海道帝国大学农学部林学实科毕业	25岁	1927年9月赴日 1928年12月入党	王明哲	
崔浚	陕西省长安县城内夏家什字二四号	早稻田大学政治经济科专门部在读	25岁	1928年5月赴日 1928年12月入党	廖以仁	
刘达纶	湖北省大冶县刘仁八二八房	早稻田大学大学部德语科中途退学	21岁	1928年10月赴日 1929年3月入党	史谦	
古杰	广东省兴宁县水口区下堡	法政大学经济科本科一年级在读	26岁	1927年10月赴日 1928年12月入党	郑畴	
黄锡俞	广东省台山县	三崎英语学校在读	24岁	1927年10月赴日 1928年5月入党	黄新英	
钟文	湖南省醴陵县伍家坊	东京高等高工学校一年级在读	22岁	1928年7月赴日 1929年6月入党	李刚	
李亚农	四川省江津县中白沙	京都帝国大学文学部在读	25岁	1929年3月入党	廖体仁	保释
邓圻	广东省广州府三水县上灶村	无,40岁,私塾主	40岁	保释		免诉
梅电龙	安徽省宿松县山北仲	(东亚同文书院毕业)				免诉
共计 36 名						

说明:表 1 以《中国共产党事件被告人氏名》为依据,结合《中国共产党日本特别支部党员姓名年龄机关赴日及入党时期职业表(第八表)》整理而成。笔者比对《中国共产党党员名簿》所记内容,对名单中的党员的年龄、赴日及入党时间、介绍人的信息进行了补充。表中所记载的党员年龄为 1930 年时的实际年龄。名单中吴福和原写作吴服和,宋建鹏部分史料作宋健鹏。

资料来源:根据日本外務省外交史料館 JACAR(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Ref.B04013034300(第 42 画像目)、各国共産党関係雑件/中国ノ部/中国共産黨員検挙関係第三卷分割 4(I-4-5-2-1_1_2_003);Ref.B04013035100(第 87 画像目)、第五卷分割 1(I-4-5-2-1_1_2_005)整理。

在日本监狱收押的 36 名党员中,梅电龙、冯骥、史怀文赴日前入党,邓圻入党时间不详,其余 32 人均在赴日后入党。个别党员从抵达日本到正式入党中间仅间隔一个月有余。党员入党时间大致集中在 1928 年 4 月至 1929 年 8 月期间,绝大多数是在校学生,平均年龄 23 岁,呈年轻化特征。入党介绍人大多数为 1 位,个别的是 2 位,且为中国共产党日本特别支部执行委员,是中国共产党日本特别支部的中枢成员。这 32 名党员由中国共产党日本特别支部直接发展并加入中国共产党日本特别支部,而非地方支部发展而来,个别成员后来被派往地方支部,成为地

方支部党员中的核心人物或领导力量,具有一定的影响力。

东京地方法院《对史殿昭等三十四名被告的一审判决》的判决书中提及中国共产党日本特别支部党员发展和程序,“党员全部由各地方支部的党员代表会议投票选举,经执行委员会决议通过后,正式从事党员活动”。^⑨根据大久保弘一《赤色支那》的考察,当时党员的入党手续大致有以下几个步骤:1.需要党员一人及以上作为入党介绍人。介绍人负责在一定期限内对入党申请人进行考察。2.由入党介绍人向支部会议提议,提请讨论是否同意申请人入党,

并通知申请人由支部书记亲自对其进行考察,同时向组织部报备。3.对曾加入国民党及其他国家主义社团的人员,事先报告组织部备案,等候执行委员会的调查决定。如批准申请人入党,则由支部书记负责通知申请人。4.在国内入党的党员抵达日本后,持支部介绍信,办理组织转接手续。党组织若同意申请人入党,以口头通知或允许出席支部内小组会议并向小组成员介绍的方式通知申请人,不颁发入党证,偶尔有以书信方式通知的情况,信上写明允许“入校”等字样。^④

然而,从被拘捕党员的审讯笔录来看,在当时特殊时期的特殊背景下,并非完全按照上述常规的入党程序进行。

中国共产党日本特别支部利用国民党内部矛盾,吸收国民党党员入党,从而瓦解国民党组织,与国民党(右派)做斗争。在1929年10月26日,曾是国民党党员的朱大容供述道:“我原本是中国国民党党员,因为我与同窗张觉人交恶,他将我排挤至长崎支部,张对我进行压迫。同窗李昂鸣与我关系甚好,每日来我处,对我讲中国共产党的好和国民党的坏,同居者王握瑜也如此。我站在反对张的立场上,有了想要加入中国共产党的想法。在北海道陈希的入党邀请下,我决定入党。今年4月中旬,我加入中国共产党。”^⑤朱大容原是国民党员,李昂鸣和王握瑜见朱大容同国民党员张觉人有嫌隙,在朱深受排挤之际,向他伸出橄榄枝,引导朱大容向党组织靠拢,在思想方面对朱进行宣导,深化他对共产党和共产主义的认识。朱在后来的供词中谈道:“我对共产党的认识如下。中国共产党发展革命,破除一切军阀,现在中国共产党党员急剧增加。打倒旧时存在的封建军阀、将土地收归国有,现在个人所有的土地及其他财产均收归国有,不承认私有。以实现世界革命为目标,限制大资本……”^⑥可见,朱大容对共产党的认识是具有一定深刻性的。

中国共产党日本特别支部也吸收革命性强、意志坚定、崇尚共产主义的积极分子入党。例如,李亚农1927年考入京都帝国大学文学部,开始专门研究马克思主义学说。1928年5月,李亚农加入京都留日学生组织的社会科学研究会,对共产主义产生强

烈共鸣,受到中国共产党机关报《布尔塞维克》《红旗》以及左倾思想报刊的宣传,积极向中国共产党在日本的组织靠拢。1929年1月,李亚农母亲受尽贫穷与封建家庭的折磨后去世,对李亚农的革命思想是一次巨大的提升。他对封建旧社会产生强烈憎恶,决心加入中国共产党,投身实际革命运动之中。2月,李亚农从京都银阁寺一带去神户、大阪。途中,李向京都支部书记廖体仁表明加入中国共产党的意向。3月下旬,李亚农经廖体仁介绍入党。^⑦陈淑文等人同样如此。^⑧1928—1929年间,中国共产党日本特别支部在发展党员工作方面倾注全力,吸收崇尚马列主义的积极分子入党,这部分党员具备坚定的革命意志和反帝反封建思想,入党之后开展思想教育学习,既壮大了党的队伍,也起到凝聚革命力量的作用。

此外,中国共产党日本特别支部还吸收具有先进性的群团组织集体入党。赤共社原本就属于共产主义派组织,受中国共产党日本特别支部的领导,主要由留日中国学生负责组织建立。1929年4月,赤共社改称少年共产党。^⑨5月,赤共社在党员李味五的介绍下,以集体入党的方式,正式加入中国共产党。

此外,入党程式也呈现多样性。大批党员是先加入受中国共产党日本特别支部领导的外围社团或组织,经过一段时间的思想教育、意志磨砺和考察,由正式党员介绍,接受党组织审查后,正式加入中国共产党。如漆宗兴1928年4月到仙台下,加入留日仙台学生联合会。后在庞大恩的介绍下入党。^⑩张国衡1929年3月经古杰介绍加入社会科学研究会,隶属牛込组,每周参加研究会,研究讨论思想问题。4月,经古杰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日本特别支部,隶属牛込支部,每周一次于牛込区喜久井町青光馆内同冯曼曼等人召开支部会议,在党部的指示下参加研究讨论。^⑪伍博平^⑫3月经古杰介绍加入中华留日社会科学研究会,4月又经古杰介绍入党。^⑬宋长仁1929年7月1日经徐元宵介绍加入留日中国社会科学研究会,8月经徐元宵介绍入党,隶属明大支部。^⑭此外,冈山支部的程绍襄,神户支部的苏德赐、杨蒂坚、鲍绍文等人,均以上述方式加入中国共产党。

日本特别支部的。

同时,也存在一些特殊的入党程式,如邀请入党。1929年1月初,漆相卫在东京市内旅行期间,受到党组织的关注。约十天之后,他在京都帝国大学校园内收到来自中国共产党日本特别支部执行委员东京帝国大学郑畴向其发出的入党邀请,漆相卫口头承诺入党。1月中旬,漆相卫再次赶赴东京,根据日本特别支部党员王明哲的意见,于东京市小石川区音羽町六丁目江戸庄,正式向东京帝国大学学生余炳文表明入党意愿。之后,在东京目白站前由刘恩波、王明哲为漆相卫办理入党手续。1月下旬,漆相卫手持日本特别支部向京都支部书记廖体仁开具的入党通知书,加入京都支部。^⑤另外,对于在国内就已参加党领导的先进组织的人员,缩短考察程序,实现快速入党。李梦秋1929年7月在上海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直接受上海特别市党部闸北区北四川路支部领导。9月15日,李梦秋加入中华留日学生社会科学研究会,20日,加入中国共产党日本特别支部,隶属牛込支部。23日,经常务委员会决议,派李梦秋至社会科学研究会工作。29日,李梦秋在“社研”第三届代表大会上当选为组织委员,负责党的宣传工作。^⑥

三、遍地开花:中共在日本的支部建设及支部活动

1927年“四一二”“七一五”反革命政变以后,在中国共产党日本特别支部的领导下,地方支部开启重建工作,如仙台支部、东京支部、神户支部及京都支部等。除地方支部建设外,中国共产党日本特别支部的部分女党员曾成立妇女支部,希冀在日本开展妇女战线工作,但未能如愿。

1. 仙台支部的建设及活动

仙台支部由廖涤心、夏邦奇、李宝华及庞大恩四人共同建立,^⑦成立时间推测在1928年1月至6月间。根据庞大恩的供述,其于1928年赴仙台,经廖涤心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廖、夏、李三人回国后,1928年6月至1929年3月,庞大恩担任仙台支部书记,大力发展党员,壮大党组织队伍。

1927年11月至1928年10月间,仙台支部以留日仙台学生联合会的名义,向留日学生邮寄党组织

机关报刊通讯录,积极宣传共产主义。^⑧漆宗兴1928年4月抵仙台,加入留日仙台学生联合会,在庞大恩的介绍下入党。1929年3月至6月,漆宗兴任支部书记期间,发展社会科学研究会成员马季唐入党。1928年3月,扶学铤经刘懋儒介绍,于京都入党。^⑨5月,扶学铤抵达仙台,加入仙台支部。1929年6月下旬至9月末,扶学铤任仙台支部书记,其间发展谢位鼎、周恒恩^⑩入党。9月,扶学铤以仙台代表身份参加了东京府下高日寺召开的社会科学研究会总联盟代表会议。

庞大恩、扶学铤、漆宗兴均是东北帝国大学工学部学生,三人在仙台支部期间,遵照中国共产党日本特别支部的指令开展工作,在中国共产党日本特别支部内部被认为是社会科学研究会派人物,主张在贫农、雇农及中农当中发展党员。^⑪12月29日,宫城县知事汤泽三千男致函内务大臣以“三人思想激进,且扰乱我国治安,影响中日两国邦交”为由,将三人驱逐出境。^⑫三人后经神户港乘船出发,返回上海。

2. 东京支部下属的牛込、东亚等支部的建设及活动

东京支部由牛込支部、东亚支部、明大支部以及联合支部四个支部组成。1928年至1929年间,四个支部的具体重建时间尚不明确。1927年“七一五”以后,大阪总支部被迫中止活动,东京支部的活动似已转入地下。散布在东京的党员则以“东京特别支部”的名义组织社会科学研究会、留日学生群众大会等,继续进行反日斗争。^⑬目前仅能从审讯笔录中管窥当时东京支部下属支部的零星活动。

牛込支部于1929年5月至7月中旬每周在东京牛込区喜久井町青光馆内召开支部会议。列席支部会议的有:支部书记姚志崇,党员冯曼曼、路彦、张国衡等。牛込支部编辑并出版发行机关刊物《火花》。6月23日,牛込支部组织党员在神田青年会举办的沙基惨案纪念会上派发宣传单和小册子,开展党的宣传工作。^⑭4月,伍博平经古杰介绍入党后,加入牛込支部。7月至9月间,伍博平任牛込支部书记,领导牛込支部开展有关中东铁路问题的宣传工作,在成城学校等宿舍区内,散发宣传册、张贴大字报及标语,向中国留日学生宣传共产主义思想。^⑮

东亚支部在支部书记姚岸的组织下,数次召开支部会议,研究工作任务。东亚支部有党员郑柏、韩金元、詹忠琇、王劈铁、王慧媛、黄霁琴、张炳麟、胡晓春等。1929年8月下旬,东亚支部发展姚志瀛入党。9月上旬,东亚支部在姚岸处商讨支部设置、换届选举、党员职责划分及支部工作等问题。9月17日(王劈铁供述中称是25日^⑤),在支部书记王劈铁处,姚志瀛、姚岸、黄霁琴等人商讨中国时局问题及讨论张发奎与蒋介石部队战况问题,并指示姚志瀛负责神田青年会馆中国学生球队的宣传工作。10月2日,在东京府下中野町上原詹忠琇处,姚岸、詹忠琇、黄霁琴、韩金元、王劈铁、郑柏、张炳麟、冯骥等讨论支部书记姚岸辞职、发行支部大字报以及开展双十节革命宣传工作等事项。^⑥

3. 神户支部的建设及活动

神户为港口城市,历来商业气息浓厚。神户支部由邓析发起成立,党员发展及支部活动开展主要面向商人、华商华侨及外贸外事从业人员。正式成立时间推测在1929年4月前后。4月,担任神户“和平”(ピース)轮船公司仓库主任的苏德赐^⑦经邓析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⑧同月,在神户某银行任职的杨蒂坚^⑨也由邓析介绍入党。^⑩8月,在邓析暗中协助下,先后在神户商会及兰印商业银行任职的鲍绍文^⑪经苏德赐介绍后入党。^⑫

4月苏德赐、杨蒂坚入党后,神户支部在支部书记邓析主持下召开支部会议,围绕宣传共产主义思想的方法展开讨论。8月以后,神户支部指导神户社会科学研究会进行改组。邓析指派苏德赐担任神户社会科学研究会的文牍委员,负责社会主义研究材料的搜集工作;指派杨蒂坚担任神户社会科学研究会的教育委员,负责管理相关书籍以及书籍的选订工作,并兼任会计和一般事务员。神户支部在邓析的领导之下进一步扩大神户社会科学研究会规模。中国共产党日本特别支部提出将进出日本的劳工群体视作工作对象,要求各地方支部开展工人调查。神户支部着手调查神户地区中国人相关的各种工会的实际状况,并将宣传工作的重心转向劳工大众。^⑬8月31日,神户支部在神户市衣挂町进行集中学习,^⑭支部党员一致决定开展反帝同盟运动,并针对

寄港日本的中国海员开展有关中国共产党十大要求的宣传。^⑮9月初,神户支部向中国共产党日本特别支部东京支部报告神户中国工人工会状况,并以信函方式向中国共产党日本特别支部执行委员会请示能否进一步对外国船舶上的中国船员展开宣传。10月上旬,神户支部印刷《反帝宣言共产党十大要求》,计划于“双十节”向外国船舶的中国船员及在日的中国人派发。此外,神户支部收集社会科学研究相关书籍材料,暗中物色优秀分子筹备成立“艺术社”,以此作为神户支部发展党员的外围组织,壮大党员队伍和组织力量。^⑯

4. 京都支部的建设及活动

1927年12月,于清伦、廖体仁发起成立中国共产党日本特别支部京都支部。同月,袁文彰经杨贤江介绍入党,^⑰四人一同投身京都支部的创建工作。

1927年12月至1928年7月,京都支部党员在廖体仁处、杨贤江、袁文彰处,每周召开一次支部例会,讨论各种政治问题,提高党员自身的革命意识,同时注重向留日学生宣传共产主义思想。1928年9月至1929年3月中旬,京都支部集中在杨贤江及袁文彰处召开支部例会。

1928年9月,于清伦被京都支部除名。1928年12月京都帝国大学学生史殿昭,1929年3月李亚农,4月陈焘之、漆相卫等同志先后入党,加入京都支部并开始列席支部会议。

1929年4月中旬开始,史殿昭担任京都支部书记。至5月上旬,京都支部每周三在杨贤江或袁文彰处召开支部会议。会上提出当前关键任务是召集社会科学研究会开展革命宣传,明确革命斗争的对象和目标,史殿昭指出:“日本帝国政府是帝国主义分子,是中国共产党的斗争对象。而日本共产党力量薄弱,又受到日本政府镇压。我们在日本的中国共产党员必须同日本政府进行最大程度的斗争。”^⑱“同时,不论是国内的国民党,还是在日本的国民党,始终是我们眼中最大的敌人、首要的敌人,我们要集中全部力量同国民党进行斗争!”^⑲以支部会议精神为基础,史殿昭在东京的党员会议上也做了相关报告,得到东京方面的支持。京都支部依据日本特别支部中央部指令,派代表在留日学生大会春季总会

上发表《反对战争宣言》，并起草《反对军阀混战宣言》。《反对军阀混战宣言》提交中华留日学生总会审议通过后，随即向全日本的中国留学生寄送。此外，京都支部还希望通过组织读书会向留日学生宣传革命思想，^⑦因没有合适的场地，未能达到预期的宣传效果。^⑧

1929年5月，京都支部召开第一次支部全体党员会议，明确支部的工作任务和重心仍是开展革命宣传。^⑨5月中旬至6月下旬，每周三京都支部转移至京都市左京区净土寺西田町四十一番地陈焘之家中召开支部会议。会议认为留日学生缺乏革命性，应继续加大革命宣传力度，并将宣传规模扩大至普通侨民群众。^⑩根据中国共产党日本特别支部全国代表会议决议及中央部指令，京都支部派李亚农、陈焘之数次出席并指导神户召开的社会科学研究会，在会上宣传革命思想。^⑪

9月中旬，支部书记史殿昭缺席京都支部会议，陈焘之被推选为代理书记，主持京都支部工作，并两次同执行委员王哲明联系，汇报京都支部的当前工作。^⑫

5. 妇女支部建设及妇女工作受阻

妇女工作的开展及妇女支部创设，主要由陈淑文、黄琴两位女党员负责进行。然而，因受众面小、影响力不足等因素，中共在日本的妇女工作被迫中止，两位党员也转而投身反帝运动。陈淑文从上海文艺小学毕业后，进入爱国女子学校学习，其间与黄锡俞结婚。1927年9月，两人一同抵达日本。10月，陈淑文进入东亚预备学校学习，1928年3月毕业。1929年4月开始，陈淑文进入明治大学法科专业女生部一年级学习。陈淑文热心阅读《布尔塞维克》等左倾杂志，从事马克思主义研究。1928年5月，在同乡黄新英、廖以仁等劝说下，她加入中国共产党日本特别支部，隶属于高原寺支部。10月，又转入中野支部。1929年4月，陈淑文组织创建妇女支部，并亲自担任妇女支部书记。^⑬因人员较少，组织力量薄弱，缺乏影响力和受众群体，6月上旬，在陈淑文转入明大支部后，妇女支部也随之失去踪影。7月，陈淑文在党员代表大会上被选举为候补执行委员，工作重心从妇女问题转向组织领导反帝宣传工作。黄琴从

上海爱国女子学校中途退学后，于1928年1月抵达日本，同丈夫冯骥共同投身革命事业。不久，黄琴进入东亚高等预备学校学习。1929年6月，她加入共产主义组织中国妇女问题研究会，在自己家中同研究会成员讨论妇女解放及其他相关议题。因出席者人数太少，无法继续召集日常例会，该研究会被迫解散。7月，黄琴加入中国共产党日本特别支部，隶属牛込支部，8月，以普通党员身份转入东亚支部。在东亚支部，黄琴暂且放下妇女工作，与其他党员讨论反对帝国主义战争、打倒中国国民党、推动和实现世界革命等问题。^⑭至此，受相关条件限制，中共在日本的妇女支部建设及妇女工作遇阻，只能暂告一段落。

四、他山之石：中共在日本领导外围组织开展革命活动

中国共产党日本特别支部积极发展党的外围组织，如人社、时代工程社、赤共社、中国青年艺术同盟等，组织成立中华留日学生社会科学研究会及中华留日反帝同盟。

(一) 发展人社、时代工程社、中国青年艺术联盟等党的外围组织

1. 人社与赤共社

人社是以中国留日学生为主体，研究共产主义思想的组织。1928年10月，人社成立，由王茅原负责总务工作。^⑮在王茅原的召集下，人社成员时常在其住所碰面，以学术研究为名，秘密讨论时局、政治外交及社会问题，激发留日学生的反日情绪。1929年2月以后，王茅原同党员史殿昭、周其湛、汤雨林、李味五等秘密接触，并以人社代表身份参加四人的党员会议。6月26日，郑景陞在同乡陈崇仁介绍下，加入人社。^⑯人社每周定时召开例会，组织人员开展共产主义思想研究。8月下旬，王茅原在例会上提议人社加入反帝同盟、参加反帝同盟领导的示威运动，得到人社成员一致同意。加入反帝同盟后，王茅原负责反帝同盟的总务工作。9月4日下午8时，在东京银座街头，举行日、中、鲜联合反帝同盟示威运动，王茅原以人社代表身份参加游行。反帝同盟革命任务失败后，11月1日，人社在王茅原的带领下，继续反帝同盟的未尽事业，提出“反对帝国主义”“反对资

产阶级”“支持世界革命”等口号,作为人社的行动纲领,同时将组织全称确立为“中华留日左翼青年联盟”(别称“人社”)。

赤共社是中国留日学生在日本成立的共产主义组织。1929年4月以后,赤共社改称少年共产党。赤共社的主要成员有杨若僧、姚志崇、李光亚、聂余统、冯洪国、张本春、张祖锴、路彦等。^⑥赤共社每周召开一次例会,研究讨论中国政治及社会科学问题。1929年5月,赤共社在党员李味五介绍下集体加入中国共产党。

2. 时代工程社

时代工程社属于党的外围组织、共产主义的研究组织,最初由党员江佰玉、杨大乾、崔仲远、刘奋吾等领导,从事社会科学研究的时,进行反对帝国主义、与反革命集团斗争工作。

1929年4-5月,马贻云、杨可均等先后加入时代工程社。根据中国共产党日本特别市党部的指示,党员崔仲远与刘汉章及其陕西同乡杨大乾共同策划组织召开时代工程社正式成立大会。6月26日,在东京府下中野町明治大学学生江隆基住处,举行时代工程社成立大会,出席大会的有杨大乾、冯润章、江裕基、江隆基、李味五、刘奋吾、杨玉珊、韩鲁、张嘉猷、崔仲远、曾剑君、杨可均等。大会选举刘汉章任组织委员,杨可均任印刷委员。大会确立时代工程社宗旨是拥护无产阶级的利益,介绍并从事马列主义研究,援助无产阶级革命。马贻云、张嘉猷、江仲平等担任时代工程社的常务委员,江仲平负责总务工作。时代工程社在中国共产党日本特别市党部以及党员李味五指导下开展革命活动。

8月,时代工程社成员集体加入中国共产党日本特别支部领导的反帝同盟。8月18日,在东京府下大恩山的刘奋吾家中,时代工程社召开第二次大会,杨可均、张嘉猷等人出席。当时刘奋吾既是中华留日社会科学研究会总联盟干部,又担任时代工程社牛达组组长。会上时代工程社成员围绕如何实现共产主义的问题展开深入讨论。下旬,在张嘉猷家中,党员李味五与时代工程社成员等五人共同策划时代工程社集体参加9月4日晚8时日、中、鲜联合于京桥银座街头举行的反帝同盟示威运动。

在“九一游行”中,刘汉章将时代工程社编为一队,并担任一队队长。“九一游行”被迫中止后,刘汉章与四名一队队员又参加了“九四游行”。“九四游行”时,时代工程社由江裕基任队长,带领队员走上银座街头,加入反帝示威运动中。另外,马贻云、江仲平、张嘉猷、冯润章、范玉孚等则加入由日本共产党率领的队伍中,受日本共产党领导,参与示威游行。之后,时代工程社成员相继被捕。成员马贻云在被逮捕前,将时代工程社的五卅纪念宣传物资及相关宣传品邮寄回老家的友人处,避免了革命情报泄露,为组织保守了机密。

9月24日,中国共产党日本特别支部执行委员会通过决议,认为时代工程社不辱使命,已圆满完成工作任务,可就地解散,成员并入社会科学研究会。^⑧

3. 中国青年艺术联盟

中国留日青年在日本组成的中国青年艺术同盟,^⑨受中国共产党日本特别支部直接领导,宗旨是开辟艺术战线,透过文学艺术来宣扬马克思主义、共产主义的革命思想。^⑩

根据大久保弘一的考察,中国青年艺术联盟于1929年3月正式成立,其前身是东京美术研究会。原东京美术研究会的王道源、许达、李白华、沈起予、沈学(诚)、余炳(文)等人悉数加入。成立大会于东京神田的日华学会举行,日本艺术名流左派代表秋田雨雀、村山知义、藤森成吉等以特邀嘉宾身份出席。初期有成员25人,其中党员9人。该组织的口号是“为争取完成无产阶级艺术运动、实现国际无产阶级艺术战线统一”。^⑪

1929年3月,方溶经李仲明介绍加入中国青年艺术联盟。中旬,党员漆相卫介绍李亚农加入。李亚农入党后成为中国青年艺术联盟的主要负责人。^⑫6月,党员许达介绍陆巽昌加入,从事无产阶级文学的宣传及推广工作。陆巽昌以“繁荣无产阶级演剧事业”为目的,与许达、沈学诚等一起成立“时代演剧社”,并在东京筑地小剧场演出。他们以学习舞台技巧为名,结识了诸多日本左翼艺术家,一道从事无产阶级革命活动。7月,党员冯曼曼介绍伍博平加入。^⑬同时期,尚在川端绘画学校就读的石炼顽因崇尚共产主义,也加入了中国青年艺术联盟。

7月下旬,根据中国共产党日本特别支部执行委员会决议,中国青年艺术联盟与时代工程社、人社、中华留日社会科学研究会组成中华留日反帝同盟。中国青年艺术联盟全体成员集体加入反帝同盟,配合中国共产党和日本左翼无产团体,从事“打倒帝国主义”“反对帝国主义战争”“反对收回中东铁路”的无产阶级文艺事业,^⑤在留日学生中间继续宣传反对国民党、传播共产主义思想,积极发展壮大中华留日反帝同盟队伍。

石炼顽原计划参加“九四游行”,担任袭击中国公使馆敢死队队长,因计划泄露,于9月3日被所在辖区大森警察署拘捕。方溶、陆巽昌等成员也遭到日警拘捕,^⑥致使中国青年艺术联盟组织被严重瓦解,陷入瘫痪。9月15日,神户支部党员苏德赐致函中国共产党日本特别支部东京支部,要求东京支部协助在神户重建文艺战线上党的外围组织“艺术社”。^⑦

(二)组织中华留日学生社会科学研究会

1926年以后,中国留日学生在日本各处校园内以各自学校为单位组织成立社会科学研究会,研究共产主义理论,并与在日本的中国共产党联络,策划进行世界革命。^⑧

目前可知的中共在日本领导的社会科学研究会是1926年由童长荣组织成立的,它以团结留日学生及华侨、宣传马列主义为目的。^⑨而中华留日学生社会科学研究会究竟于何时何地正式成立,尚无确切定论。“四一二”后,该会遭到破坏。1927年八九月间,中共东京特别支部重新成立社会科学研究社,开始半公开活动。^⑩10月左右郑畴、陈其昌、黄利英、郑汉先等组织成立社会科学研究会。^⑪1928年4月以后,社会科学研究会直接在中共领导下开展工作,成员发展至50人,其中党员27人,发行机关刊物《海外青年》《五化》。^⑫5月,日本制造“济南惨案”。社会科学研究社在童长荣的带领下,成立“中国留日各界反日出兵大同盟”。^⑬日本当局以宣扬共产主义罪名将童长荣驱离出境,^⑭东京的社会科学研究会的活动再次遭到严重破坏。李亚农于1928年5月加入关西地区留日学生组织社会科学研究会,并由此知晓了中国共产党日本特别市党部的存在。^⑮袁文彰于1927

年12月至1928年7月间,负责指导中华留日学生总会社会科学研究会。^⑯汤雨霖于1928年4月前后,在北海道与北海道帝国大学学生周其湛、李士珽、朱大鼎、胡成梁等五人组成社会科学研究会,发行杂志《真面目》,宣传反帝国主义。^⑰由此可见,不论是“社会科学研究社”还是“社会科学研究会”,起初抑或当时并未形成统一的全国性组织,也有可能因忌惮日本当局,加之国民党右派的破坏,它在1928年5月前后,广泛散布在日本各地,尚未形成从总部到地方的垂直组织架构。日本亚洲历史资料中心所藏《中国共产党党员检举关系资料》(第一~第七卷)中,最早出现“留日中华社会科学研究会”的是马树礼的相关供述材料,其中记载马树礼(时年20岁)由党员刘凤冈介绍,于1928年11月加入中华留日社会科学研究会本乡部。^⑱

基于上述考察,中华留日社会科学研究会的成立时间在1928年11月之前,当时已经拥有个别分支机构,但是尚未形成统一支配日本全国各地社会科学研究会的局面。

1929年1月上旬,中华留日社会科学研究会于东京小石川区音羽町四丁目二十一番屋号江户庄,举行秘密会议。会议研究成立中华留日社会科学研究总联盟,目的是联系和领导日本各地的社会科学研究会。^⑲根据程绍襄供述,当时各地代表云集,如京都大学郑长群、李亚农、漆相卫,第二高等学校谢位鼎,东北帝国大学苏子衡,北海道帝国大学漆宗兴,庆应义塾大学郑道之,东北高等工业学校房斌,法政大学王哲明等。^⑳不久之后,第二次秘密会议召开,由程绍襄任会议长。会议拟定了中华留日社会科学研究会总联盟章程,制定的工作任务是联系日本全国的社会科学研究会员。^㉑

中华留日社会科学研究会按照中国共产党日本特别市党部的指示,由“研究型”转向“革命型”。房斌、潘念之、刘汉章、崔仲远、马树礼等数次开会,决定将中华留日社会科学研究会由“目前为止唯一研究性团体”进行“活动性转化”,^㉒并派刘汉章进驻中华留日社会科学研究会,列席代表大会、委员会议,参与协会活动,协助转变立会性质。刘汉章要求中华社会科学研究会以打倒中国军阀政府、援助无产

阶级运动、反对帝国主义等为行动纲领,切实从事革命活动。^⑩

1929年3月中旬,在东京市外大冈山留日中国学生所在会馆,连续两天召开中华留日学生社会科学研究会总联盟代表大会。^⑪参加人员有房斌、刘之汇、李亚农、廖体仁、谢位鼎、邓炘、郑长群等。^⑫大会的主要议题是制定社会科学研究会本年度的学习任务、拟定全国(按:指全日本)社会科学研究共同宣言。各地的社会科学研究会分别就各自的革命环境、工作目标进行了报告,并同意将社会科学研究会发展对象从中国留日学生扩大至华人华侨。

1929年3月是中国留日社会科学研究会组织人员、队伍发展壮大的一个分水岭,迎来入会高潮。大批的留日学生、华侨侨胞,在党员的动员下加入。中华留日社会科学研究会的体制、体系趋于完备,积极吸收成员,分配至下属各个支部。“社会科学研究会”在留日学生中间,成为研究马列主义、传播共产主义思想、宣扬无产阶级革命的代名词,也是诸多留学生能够近距离接触中国共产党的有效路径。

例如,1929年3月,杨可均^⑬加入中华留日社会科学研究会,编入大冈山支部。伍博平经古杰介绍加入中华留日社会科学研究会。^⑭张国衡经古杰的介绍,加入中华留日社会科学研究会,编入牛込组。^⑮4月,邹肇思^⑯在伍博平的介绍下,加入中华社会科学研究会,编入牛込支部。4月中旬,于宣力^⑰经同乡廖居仁^⑱的介绍,加入中华留日社会科学研究会。与党员林云青、崔仲远、刘凤冈一同开展革命活动。大批成员的不断涌入,壮大了组织的队伍,为革命活动的开展积蓄了力量。

1929年5月,在东京市外池上町石川的卢建奇居住处召开中华留日社会科学研究会总联盟成立代表大会。7月,中华留日社会科学研究会在中国共产党日本特别支部的指示下,集体加入反帝同盟。

(三)组织成立中华留日反帝同盟

中华留日反帝同盟是根据中国共产党日本特别支部执行委员会决议,于1929年7月下旬,由中华留日社会科学研究会、中国青年艺术联盟、时代工程社、人社共同组建的党的外围组织。中华留日反帝同盟联合日本左翼无产阶级组织、社团,以“打倒帝

国主义”“反对帝国主义战争”“反对收回中东铁路”为口号,宣传共产主义思想,组织中国留日学生、华人侨胞以及日本左翼人士,在日本进行革命活动。^⑲

1929年7月上旬,中国共产党日本特别支部在东京市外中野町上原八一六番地叶仲豪处召开东京地区夏季临时会议。临时会议直至9月初结束,其间共进行大小会议七八次。临时会议通过政治学习提高党员认识水平、宣传共产主义,同时决议成立一个以中国留日学生为主体的反帝爱国同盟组织。基于该项决议,经中国共产党日本特别支部指示,7月25日留日反帝同盟组织准备会于东京府下马込町石原“东方”处房斌家中召开,参加会议的人员有房斌、李亚农、大冈山支部全体党员等。房斌指出,依据中国共产党指示,在共产国际指导下,为动员广大留日中国学生、群众等开展反帝国主义运动,准备成立中华留日反帝同盟,并将其作为反帝同盟的下属支部。全体参会人员一致决定召开中华留日反帝同盟正式代表大会,同日本的反帝同盟组织开展积极联络。^⑳

7月27日,中华留日反帝同盟正式代表大会于东京府下杉并町马桥十四番地西湖的刘恩波家中召开,约有20多人出席,其中包括日本国际文化研究所本乡孝(曾化名藤村文夫),社会科学研究会邹肇思、刘汉章等。房斌被选举为大会主席。全体人员一致同意组成中华留日反帝同盟,并与反帝同盟日本支部建立联系。29日,中华留日反帝同盟发表成立宣言和《纪念“八一”宣言》,公开发行人机关刊物《反帝战线》(每周一期)。^㉑

8月23日,中华留日反帝同盟第二次代表大会在刘恩波处召开,约20人出席,其中包括反帝同盟日本支部书记三浦重道,日本农劳动组合全国委员会常任干事势田净稻(曾化名佐山)等。史殿昭、房斌被选为大会负责人,李亚农、方溶被任命为宣传部负责人。与会者要求进一步扩大反帝同盟规模。大会集中讨论国民政府的中东铁路收回问题,为避免中苏两国纷争,大会主张将中东铁路让给苏联,坚决反对日本对中国出兵。大会决定9月1日中华留日反帝同盟与反帝同盟日本支部及全国协议会(日本)联合开展针对中国大使馆的示威游行活动,

简称“九一游行”。

8月27日,中华留日反帝同盟第一次干部会议在房斌处召开。^⑩房斌、方溶等8名干部参加,商讨反帝示威游行方案。^⑪该方案计划示威人群于中国公使馆前集合,之后全体冲入公使馆内,破坏使馆内部设施,以张月潭为代表组成敢死队负责果断采取行动,其他人员负责宣传策应。与会干部起草题为《告日本劳动农民诸君及朝鲜台湾被压迫人民诸君》日文版宣传单,主张将活动影响扩大至日本普通民众。8月28日,杨可均、张璋、石炼顽、刘凤冈、方溶等8名共产党员会面,详细制订了示威及袭击中国公使馆行动计划,杨可均被任命为监视队员。^⑫8月30日,计划泄露,房斌紧急在方溶家中召开反帝同盟第二次干部会议。^⑬因示威游行涉及袭击中国大使馆,日本政府要求中华留日反帝同盟立即中止实施相关计划。与会干部分析,根据日本政府通知,袭击中国大使馆的计划虽然中途受挫,但示威游行尚在其允许范围之内。房斌等党员决定停止袭击中国大使馆计划,放弃“九一游行”,改为“九四游行”,^⑭示威地点变更为银座街头,时间为9月4日晚8时。决议通过之后,反帝同盟向散布在日本各处的下属分支机构下达通知,要求各分支机构配合总部,就地制定方案、配合开展反帝同盟运动。例如,接到该通知后,8月31日邓忻在神户社会科学研究会提出神户支部反帝同盟配合方案是开展针对寄港日本的船员的革命宣传。^⑮

“九四游行”当日,余斌文、房斌、李亚农、王明哲、方溶、史殿昭、许达、叶仲豪等党员率领各自组员奔赴银座,沿途向日本民众派发传单,^⑯高喊“反对帝国主义战争”“反对收回中东路”“拥护苏维埃”等口号。游行队伍被事先埋伏好的日本警察阻挠、冲散,大批参加游行的留日学生不幸被捕。^⑰

事件发生以后,中国共产党日本特别支部立即组织营救被捕留日学生。方溶、王明哲及刘汉章三人作为中华留日反帝同盟责任人,在东京各大学校的校舍内组织集会,发表宣言和檄文,号召中国留日学生共赴中国大使馆及日本警视厅救出被捕学生。

目前,已发表的有关“东京事件”的研究成果中,对于该事件中中国共产党日本特别支部及中华留日

反帝同盟与日本同志的联络经过,尚未完全厘清,且有部分史实混淆之处,^⑱笔者依据《中国共产党党员检举关系资料》(第一~第七卷)对这部分内容进行了整理,以求还原部分历史原貌。

1929年7月,国际文化研究所在东京举办“暑期大学”,李亚农任中文讲师。他经国际文化研究所本乡孝的介绍,认识了该大学德语教师、政治自由劳农同盟干部井汲越次。之后,二人在东京神田区文化学院校园内会面长谈。井汲越次提出日中反帝同盟应当建立联络关系,因为日本的指挥部力量极其薄弱,日本需要中国的援助等。7月25日,李亚农根据日本特别支部常务委员古杰的指示,与日本左翼团体进行联络。李亚农作为中方与日方的联络员,在中国留日反帝同盟准备会中同井汲等人多次进行联络。7月28、29日,在井汲越次家中,井汲越次、三浦重道(反帝同盟日本支部书记)及干部一人共同起草了《反帝支部创立宣言草案》,李亚农受邀至井汲家中并旁听了相关审议过程。三浦建议由李亚农担任两国反帝同盟间的联络任务。

8月上旬,在廖体仁的授意下,李亚农以中华留日反帝同盟的名义起草《向日本工人农民之檄文》。李亚农将印刷完成的宣传单及其他宣传物品交付其家人,配合和资助日本反帝同盟的宣传动员工作。8月20日,李亚农根据古杰指示,拜访井汲越次,与他讨论中东铁路问题,并转告他中华留日反帝同盟计划进行示威活动。21、22日,李亚农在井汲越次家中,同井汲越次、三浦重道两人会面。三浦向李亚农提出申请,希望允许反帝同盟日本支部参加示威运动。李亚农转告三浦重道,以日本工会负责人的身份,出席中华留日反帝同盟第二次代表大会。23日,三浦重道及日本工会全国协议会相关人员势田泽稻共同出席中华留日反帝同盟第二次代表大会,宣传反帝运动,计划开展示威活动。会议结束后,势田泽稻提出反帝同盟日本支部领导层力量极为薄弱,不能独立完成指挥,(日本)全国协议会要向赤色工会国际请示,根据赤色工会国际下达的指示再开展活动。在接到指示后,势田泽稻会将详细情况如实转告古杰。26、27日,李亚农两次在东京市神田区神保町田泽咖啡屋与势田泽稻会面,就示威游行事项进

行联络。其间,势田泽稻将(日本)全国协议会寄给赤色工会国际的请示信给李亚农,并且因古杰不通晓日本文书,请李亚农代为翻译为中文。29日,李亚农在田泽咖啡屋将信函返还给势田泽稻。

9月1日,得到古杰许可,李亚农将党员余炳文介绍给井汲和势田,并嘱托双方后续对接事宜。(日本)全国协议会收到赤色工会国际的回复要求(日本)全国协议会协助联络日本共产党,并努力配合中国共产党完成当前任务。(日本)全国协议会开始准备工作。与此同时,李亚农接到日方请求,因日本方面尚未准备就绪,希望活动能够延期至4日进行。2日,在势田泽稻的介绍下,李亚农在东中野附近路上,同井汲次男(曾化名中井)会面。之后,在东京市外落合町上落合四百八十番地,李亚农同本乡孝会面,谋划袭击中国大使馆一事,并告诉他们4日晚8时许在银座举行示威运动。由此,最终确定中日反帝同盟共同举行示威游行一事。李亚农联络完毕后,向古杰报告,等待古杰发令。

党外工作方面除了发展党的外围组织以外,自1929年1月以后,中国共产党日本特别支部先后5次发行机关刊物《火花》,利用1928年11月7日的十月革命纪念日,12月广州起义一周年纪念日,1929年1月列宁·李卢第五、十周年纪念日,2月7日京汉铁路工人惨案纪念日,3月18日上海暴动纪念日,5月1日劳动纪念日,5月4日北京学生运动纪念日,5月7日及9日国耻纪念日,5月30日上海南京路惨案纪念日,6月23日广东沙基惨案四周年纪念日,8月1日反帝国主义战争宣传日及9月1日国际青年纪念日等,发表各式相应的宣言、文章,在留日中国学生间分发、传阅,抓住机会,积极宣传反对帝国主义、反对军阀混战、打倒国民党及拥护共产党等。

五、隐秘与显现:中国共产党日本特别支部与日共的关系

因缺乏详实的史料佐证,有关中国共产党日本特别支部与日本共产党之间早期联络往来的具体情况尚不明确。日本共产党1922年7月15日成立之始,屡次被日本政府强制取缔、勒令解散。1927年日共代表渡边政之辅提出著名的“二七纲领”,即反对日本侵略中国以及进行战争准备。此后,日共又根

据共产国际的指示提出在日本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并喊出“打倒天皇制、废除寄生制土地所有、实行7小时劳动制”的口号。1928年“三一五事件”爆发,1600名日共党员被拘捕,1929年“四一六事件”爆发,又有1000名日共党员被拘捕,甚至连日共领导人山本宣治也遇刺身亡。两次事件之后,在日本国内仅剩一小部分日共党员坚持革命斗争,日共党组织已濒临崩坏,战斗力羸弱不堪,难成气候。日共遭受日本政府强行打压,致使中国共产党日本特别支部早期与日共之间的关系显得额外隐蔽。目前只能从仅存的中国共产党日本特别支部党员关于日本特别支部的成立宗旨及与日共个别党员来往记录中,略窥一二。

中国共产党日本特别支部是中国共产党下属的海外支部,其总目标与中国共产党本质上并无二致,即消除剥削、消灭私有制,以马列主义为指导,以暴力革命的方式推翻旧的世界政治经济体制,建立无产阶级专政,实现共产主义。另外,中国共产党日本特别支部又具有一定的特殊性,即负责中共与日共的联络任务,加速在中日两国间开展革命,获取日共对中国革命的援助,同时在中国革命胜利之后,中国共产党日本特别支部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策应和援助日共推翻日本现行国体制度,消灭土地私有制,建立民主共和政体。^⑩

1929年10月26日,日本警方就中共与日共是否存在关系审讯了长崎支部党员李昂鸣。^⑪李昂鸣回击道:“中国共产党与日本共产党同属第三国际,两党间存在紧密联系是不难想象到的。”警部山崎继续追问:“你是事先知道中国共产党与日本共产党有联络关系才入党的吗?”李回答:“这些关系由在东京的党员干部们决定的,我只不过断定两党间存在这种联系,但至今并不知晓详情。我入党时充分认识到中国共产党与日本共产党将来或许会有某种联系。”^⑫根据李昂鸣的回答可以推测得知的是,当时与日共的联络可能主要由中国共产党日本特别支部中央部或东京支部负责,地方支部并不直接与日共或是日共党员接触。

根据李亚农供述,在中国共产党日本特别支部的协调下,1929年中共与日共两党曾经草拟联合宣言并最终发表在中共机关刊物《布尔塞维克》上,^⑬即

《中国共产党日本共产党联合告中日两国劳苦民众宣言》(后文中简称《联合宣言》)。《联合宣言》明确指出,日本帝国主义加紧剥削中日两国劳苦民众,是世界无产阶级,尤其是中日无产阶级最直接的敌人。日本帝国主义勾结中国国民党,扶持中国反动资产阶级,屡次出兵绞杀中国革命,同时在日本国内以暴力方式镇压革命力量。中国国民党与日本帝国主义沆瀣一气。中国国民党借国民政府之手屠杀数万工农革命群众,日本政府发动“三一五”事件逮捕大批无产阶级和进步人士。因此,反抗日本帝国主义的压迫、反抗中国资产阶级的反革命统治,既是中国革命的任务,也有助于日本革命取得成功。中日两国无产阶级的革命在实质上是紧密相连的。中日两国共产党是两国无产阶级的先锋队。《联合宣言》号召中日两国的革命无产阶级联合起来,在中国共产党和日本共产党的领导下,进行武装暴动,共同推翻反动政权、终结反动统治,建立革命政府。在《联合宣言》最后,喊出了“打倒中国地主资产阶级的国民党政府”“打倒日本地主资产阶级的天皇政府”“中日两国的劳动群众联合起来”“世界革命万岁”的口号。^⑤

中共与日共的联合宣言同时也成为中国共产党日本特别支部发展与日共合作关系的政治基础和基本原则,中国共产党日本特别支部与日共以此为共同行动指南,积极携手、精诚协作,致力于在日本展开革命活动。

在反帝同盟领导下的反帝运动中,日本共产党员率领中国共产党员及留日学生马贻云与江仲平、张嘉猷、冯润章、范玉孚等参加“九四游行”,赴银座的中华民国驻日本大使馆及日本陆军省官厅前进行示威。^⑥史料中虽仅存寥寥数语,却可歌可泣,成为中国共产党日本特别支部与日共一起共同抗争的历史鉴证。

余论

1929年9月4日,日警逮捕参加“九四游行”的中国共产党日本特别支部党员嫌疑人14名。10月3日上午,东京、札幌、仙台、名古屋及京都市采取一致行动,逮捕130多人。之后根据对上述地区被捕者的审讯结果,日警又陆续在横滨、神户、长崎及冈山等地开展了同样的行动。截至11月26日,累计逮捕人

数约225人。关押中国共产党日本特别支部党员嫌疑人95名。1931年4月28日,东京地方法院对34名被捕的中共党员进行一审判决,对其中2人(林云青、梅电龙)免于起诉,对其余32名(史殿昭等)以违反《治安警察法》第二十八条为罪名,提起刑事诉讼。^⑦

从本质上来说,中国共产党日本特别支部在日本被打压的根本原因在于共产主义与彼时日本国内盛行的国家主义、军国主义不相符,与日本制定的侵略国策完全相悖,致使日本政府高度打压日本国内盛行的、包括中国留日学生在内的社会主义运动和共产主义运动。同时这也是日本政府“扶蒋反共”政策演变的必然结果。中国共产党日本特别支部在日本的革命活动迫使日本政府认为集结在中国共产党日本特别支部周围的尽是一些“不逞之徒”、扰乱社会安宁的“动乱分子”,特别是1927年“四一二”“七一五”之后,中国共产党在中国国内遭到国民政府的血腥镇压,中国共产党存在的合法性受到日本政府的质疑和否定,中国共产党日本特别支部及党员被日本政府认定为非法党派、激进分子。这为日本政府在日本国内大肆搜捕中国共产党日本特别支部党员提供了理由和合法性支持。其次,中国共产党日本特别支部主张以暴力革命方式推翻旧的政治体制,在工农专制下推行共产主义,推翻封建旧制,主张工农在政治上的平权,实现民权、反对皇权,以期建立民主共和政体。这不仅与日本当时“皇权至上”的天皇制度格格不入,更被视作是水火难容的极端敌对思想。同时,中国共产党日本特别支部提出“反对帝国主义、军国主义、天皇主义”,同日本国内盛行的法西斯主义有着本质性区别以及无法调和的矛盾。再者,中国共产党日本特别支部领导中国留日学生、华人华侨在日本国内宣传社会主义,宣扬民主革命思想,号召广大民众反抗日本帝国主义的压迫,积极开展示威游行活动。中国共产党日本特别支部被日本政府认为扰乱日本社会治安、密谋颠覆日本政权,极有可能引发日本社会动荡。另外,中国共产党日本特别支部领导外围组织计划袭击中华民国驻日使馆,并领导反帝示威游行群众在中国驻日大使馆、日本参谋本部、陆军省官厅举行抗议活动,致使日本政府面临内政外交双重压力。

1929年10月中国共产党日本特别支部被日本政府以“非常手段”大肆镇压,中国共产党日本特别支部党员被拘捕。然而从某种意义上,这对中国共产党日本特别支部来说也算得上是另一种成功,它至少说明中国共产党日本特别支部在日本的革命活动已威胁到日本法西斯统治,其存在令日本帝国主义者惊颤生畏。中国共产党日本特别支部以其独有方式和特殊身份在日本播撒了革命的火种,宣传了马克思主义思想。而与日本截然相对的是,中国革命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之下走上了与日本侵略者抗争的民族自觉之路。

注释:

①石川禎浩「施存統と中国共産党」、『東方学報』、1996年68期、245-358頁。

②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编著《抗战英烈谱》,团结出版社2017年版,第10页。

③王宜田、丁伟:《中共党史上的“东京事件”》,《中共党史资料》2009年第4期;陈声珩:《1929年东京事件与中日交涉》,《民国档案》2014年第1期。

④小谷一郎:《东京左联成立前史(其一)》,吴俊编译《东洋文论——日本现代中国文学论》,浙江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225-286页。

⑤张天放、濮清泉:《国民党东京支部的左右派斗争》,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文史资料选辑》第60辑,中华书局1979年版,第116-132页。

⑥徐志民:《中共东京支部考论》,《中国社会科学》2019年第5期;刘建美、杨德山:《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共东京支部始末》,《北京党史》2005年第5期。

⑦石川禎浩「施存統と中国共産党」、『東方学報』、1996年68期、245-358頁;石川禎浩:《中国共产党成立史》,袁广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年版。

⑧参謀本部『支那共産党運動史』、出版社不詳、1931年。

⑨外務省情報部第三課編『赤色支那誌』、日本外務省情報部、1940年;外務省情報部『支那共産党史』、外務省情報部、1932年。

⑩JACAR(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Ref.B04013035700(第1画像目から第22画像まで)、各国共産党関係雑件/中国ノ部/中国共産党検挙関係第六巻2.其他 分割1(I-4-5-2-1_1_2_006)(外務省外交史料館)。

⑪参謀本部『支那共産党運動史』、242-246頁。

⑫JACAR(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Ref.B04013027700(第28画像目から第41画像まで)、各国共産党関係雑件/中国ノ部/中国共産党員検挙関係 第一巻 分割4(I-4-5-2-1_1_2_001)(外務省外交史料館)。

⑬JACAR(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Ref.B04013027700(第28画像目から第41画像まで)、各国共産党関係雑件/中国ノ部/中国共産党員検挙関係 第一巻 分割4(I-4-5-2-1_1_2_001)(外務省外交史料館)。

⑭参謀本部『支那共産党運動史』、242-246頁。

⑮JACAR(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Ref.B04013035700(第1画像目から第22画像まで)、各国共産党関係雑件/中国ノ部/中国共産党検挙関係 第六巻2.其他 分割1(I-4-5-2-1_1_2_006)(外務省外交史料館)。

⑯参謀本部『支那共産党運動史』、242-246頁。

⑰JACAR(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Ref.B04013035700(第1画像目から第22画像まで)、各国共産党関係雑件/中国ノ部/中国共産党検挙関係 第六巻2.其他 分割1(I-4-5-2-1_1_2_006)(外務省外交史料館)。

⑱JACAR(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Ref.B04013035700(第1画像目から第22画像まで)、各国共産党関係雑件/中国ノ部/中国共産党検挙関係 第六巻2.其他 分割1(I-4-5-2-1_1_2_006)(外務省外交史料館)。

⑲JACAR(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Ref.B04013027700(第35画像目)、各国共産党関係雑件/中国ノ部/中国共産党員検挙関係 第一巻 分割4(I-4-5-2-1_1_2_001)(外務省外交史料館)。

⑳分别是北海道支部(负责人李士瘦)、京都支部(史殿昭)、仙台支部(漆宗兴)、长崎支部(简文)、神戸支部(登祝崑)、横滨支部(香荫堂)、东京的牛込支部、大冈山支部(书记钟文)、东京联合支部(书记刘恩波)、东亚预备校支部(书记姚岸)及明大支部(书记左鸿喧)。京都支部下辖名古屋支部、冈山支部和广岛支部,仙台支部下辖秋田支部、盛冈支部和福岛支部。其中,横滨支部是8月由潘少庭携横滨地区的共产党员组织成立的,当时潘任横滨支部书记。

㉑JACAR(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Ref.B04013035700(第1画像目から第22画像まで)、各国共産党関係雑件/中国ノ部/中国共産党検挙関係 第六巻2.其他 分割1(I-4-5-2-1_1_2_006)(外務省外交史料館)。

㉒参謀本部『支那共産党運動史』、242-246頁。

㉓JACAR(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Ref.B04013035700(第1画像目から第22画像まで)、各国共産党関係雑件/中国ノ部/中国共産党検挙関係 第六巻2.其他 分割1(I-4-5-2-1_1_2_006)(外務省外交史料館)(外務省外交史料館)。

②④郑长群,又名郑彰群,假名张启富。1931年春归国,负责“社联”(中国社会科学家联盟)工作,后被捕。参见史存直:《“社联”活动情况点滴》,中共上海市委党史研究室编《上海党史资料汇编》第2编《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下,上海书店出版社2018年版,第591页。

②⑤JACAR(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Ref.B04013035700(第1画像目から第22画像まで)、各国共産党関係雑件/中国ノ部中国共産党検挙関係 第六巻2.其他 分割1(I-4-5-2-1_1_2_006)(外務省外交史料館)。

②⑥大久保弘一『赤色支那』、高山書院、1938年、86頁。JACAR(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Ref.B04013035700(第1画像目から第22画像まで)、各国共産党関係雑件/中国ノ部中国共産党検挙関係 第六巻2.其他 分割1(I-4-5-2-1_1_2_006)(外務省外交史料館)。

②⑦参謀本部『支那共産党運動史』、242-246頁。

②⑧7月中旬第三次党员大会上最终确定“中国共产党日本特别支部”名称一事,在日本参謀本部调查结果中也得到印证。

②⑨JACAR(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Ref.B04013035700(第1画像目から第22画像まで)、各国共産党関係雑件/中国ノ部中国共産党検挙関係 第六巻2.其他 分割1(I-4-5-2-1_1_2_006)(外務省外交史料館)。

②⑩参謀本部『支那共産党運動史』、242-246頁。

②⑪JACAR(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Ref.B04013035700(第22画像)、各国共産党関係雑件/中国ノ部中国共産党検挙関係 第六巻2.其他 分割1(I-4-5-2-1_1_2_006)(外務省外交史料館)。

②⑫梅电龙化名高乔平于8月上旬抵达日本东京。不久就因日本共产党事件被日警逮捕,随身携带的资金被没收。1931年2月14日,经东京地方法院一审,鉴于无犯罪事实,撤销其犯罪嫌疑罪名,对梅电龙免于起诉。参见参謀本部『支那共産党運動史』、242-246頁;JACAR(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Ref.B04013035700(第22画像)、各国共産党関係雑件/中国ノ部中国共産党検挙関係 第六巻2.其他 分割1(I-4-5-2-1_1_2_006)(外務省外交史料館)。

②⑬JACAR(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Ref.B04013035700(第1画像目から第22画像まで)、各国共産党関係雑件/中国ノ部中国共産党検挙関係 第六巻2.其他 分割1(I-4-5-2-1_1_2_006)(外務省外交史料館)。

②⑭参謀本部『支那共産党運動史』、242-246頁。

②⑮日语原文写作“箕”字,该字并无实意,笔者按照该汉字的日音类比,推测应为监狱之意。

②⑯JACAR(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Ref.B04013034200(第2画像目)、各国共産党関係雑件/中国ノ部/中国共産党員

検挙関係 第三巻 分割3(I-4-5-2-1_1_2_003)(外務省外交史料館)。

②⑰JACAR(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Ref.B04013034200(第90画像目)、各国共産党関係雑件/中国ノ部/中国共産党員検挙関係 第三巻 分割3(I-4-5-2-1_1_2_003)(外務省外交史料館)。

②⑱JACAR(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Ref.B04013034300(第46画像目)、各国共産党関係雑件/中国ノ部/中国共産党員検挙関係 第三巻 分割4(I-4-5-2-1_1_2_003)(外務省外交史料館)。

②⑲JACAR(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Ref.B04013035700(第1画像目から第22画像まで)、各国共産党関係雑件/中国ノ部中国共産党検挙関係 第六巻2.其他 分割1(I-4-5-2-1_1_2_006)(外務省外交史料館)。

②⑳大久保弘一『赤色支那』、87-88頁。

②㉑JACAR(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Ref.B04013033600(第29画像目)、各国共産党関係雑件/中国ノ部/中国共産党員検挙関係 第二巻 分割1(I-4-5-2-1_1_2_002)(外務省外交史料館)。

②㉒JACAR(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Ref.B04013033600(第30画像目)、各国共産党関係雑件/中国ノ部/中国共産党員検挙関係第二巻分割1(I-4-5-2-1_1_2_002)(外務省外交史料館)。

②㉓JACAR(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Ref.B04013033800(第5画像目から第14画像まで)、各国共産党関係雑件/中国ノ部/中国共産党員検挙関係 第二巻 分割3(I-4-5-2-1_1_2_002)(外務省外交史料館)。

②㉔JACAR(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Ref.B04013034100(第35画像目)、各国共産党関係雑件/中国ノ部/中国共産党員検挙関係 第三巻 分割2(I-4-5-2-1_1_2_003)(外務省外交史料館)。

②㉕JACAR(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Ref.B04013033800(第52画像目から第53画像まで)、各国共産党関係雑件/中国ノ部/中国共産党員検挙関係 第二巻 分割3(I-4-5-2-1_1_2_002)(外務省外交史料館)。

②㉖JACAR(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Ref.B04013033800(第37画像目から第39画像まで)、各国共産党関係雑件/中国ノ部/中国共産党員検挙関係 第二巻 分割3(I-4-5-2-1_1_2_002)(外務省外交史料館)。

②㉗JACAR(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Ref.B04013033800(第54画像目)、各国共産党関係雑件/中国ノ部/中国共産党員検挙関係 第二巻 分割3(I-4-5-2-1_1_2_002)(外務省外交史料館)。

②㉘伍博平1928年赴日留学,入成城学校。3个月后退学,

备考明治大学经济史料。

④JACAR(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Ref.B04013034100(第34画像目)、各国共産党関係雑件/中国ノ部/中国共産党員検挙関係 第三卷 分割2(I-4-5-2-1_1_2_003)(外務省外交史料館)。

⑤JACAR(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Ref.B04013033800(第53画像目)、各国共産党関係雑件/中国ノ部/中国共産党員検挙関係 第二卷 分割3(I-4-5-2-1_1_2_002)(外務省外交史料館)。

⑥JACAR(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Ref.B04013033800(第20画像目から第22画像まで)、各国共産党関係雑件/中国ノ部/中国共産党員検挙関係 第二卷 分割3(I-4-5-2-1_1_2_002)(外務省外交史料館)。

⑦JACAR(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Ref.B04013033800(第49画像目から第50画像目まで)、各国共産党関係雑件/中国ノ部/中国共産党員検挙関係 第二卷 分割3(I-4-5-2-1_1_2_002)(外務省外交史料館)。

⑧夏邦奇,时日本东北帝国大学工学部学生。李宝华,时日本东北大学医学部学生。庞大恩,祖籍广西兴业县,时年29岁,日本东北帝国大学工学部学生。

⑨JACAR(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Ref.B04013033800(第37画像目から第39画像まで)、各国共産党関係雑件/中国ノ部/中国共産党員検挙関係 第二卷 分割3(I-4-5-2-1_1_2_002)(外務省外交史料館)。

⑩漆宗兴,祖籍四川江津县,时年23岁,日本东北帝国大学工学部学生。扶学铤,祖籍湖南省溆浦县,时年27岁,日本东北帝国大学工学部学生。刘懋儒,京都大学经济科三年级学生,扶学铤同乡。

⑪二人均为仙台社会科学研究会成员。

⑫JACAR(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Ref.B04013033800(第37画像目)、各国共産党関係雑件/中国ノ部/中国共産党員検挙関係 第二卷 分割3(I-4-5-2-1_1_2_002)(外務省外交史料館)。史料中用“小雇农”一词。

⑬JACAR(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Ref.B04013033800(第37画像目)、各国共産党関係雑件/中国ノ部/中国共産党員検挙関係 第二卷 分割3(I-4-5-2-1_1_2_002)(外務省外交史料館)。

⑭黄鼎臣:《从中共东京特支到反帝大同盟》,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革命史资料》(1),文史资料出版社1980年版,第27-42页。

⑮JACAR(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Ref.B04013034000(第52画像目から第54画像まで)、各国共産党関係雑件/中国ノ部/中国共産党員検挙関係 第二卷 分割3(I-4-5-2-1_1_2_003)(外務省外交史料館)。

⑯JACAR(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Ref.B04013034100(第34画像目)、各国共産党関係雑件/中国ノ部/中国共産党員検挙関係 第三卷 分割2(I-4-5-2-1_1_2_003)(外務省外交史料館)。

⑰JACAR(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Ref.B04013033800(第48画像目)、各国共産党関係雑件/中国ノ部/中国共産党員検挙関係 第二卷 分割3(I-4-5-2-1_1_2_003)(外務省外交史料館)。

⑱JACAR(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Ref.B04013033800(第47画像目)、各国共産党関係雑件/中国ノ部/中国共産党員検挙関係 第二卷 分割3(I-4-5-2-1_1_2_003)(外務省外交史料館)。

⑲时年24岁,祖籍广东。入党前月工资150日元,相当于日本中产阶级生活水平。

⑳JACAR(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Ref.B04013034000(第56画像目)、各国共産党関係雑件/中国ノ部/中国共産党員検挙関係 第三卷 分割1(I-4-5-2-1_1_2_003)(外務省外交史料館)。

㉑时年22岁,祖籍广东省中山村。入党前月工资85日元。

㉒JACAR(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Ref.B04013034000(第57画像目)、各国共産党関係雑件/中国ノ部/中国共産党員検挙関係 第三卷 分割1(I-4-5-2-1_1_2_003)(外務省外交史料館)。

㉓时年25岁,祖籍广东省中山村。

㉔JACAR(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Ref.B04013034000(第58画像目)、各国共産党関係雑件/中国ノ部/中国共産党員検挙関係 第三卷 分割1(I-4-5-2-1_1_2_003)(外務省外交史料館)。

㉕JACAR(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Ref.B04013034000(第56画像目)、各国共産党関係雑件/中国ノ部/中国共産党員検挙関係 第三卷 分割1(I-4-5-2-1_1_2_003)(外務省外交史料館)。

㉖原文为日语“合宿”一词。

㉗JACAR(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Ref.B04013034000(第56画像目)、各国共産党関係雑件/中国ノ部/中国共産党員検挙関係 第三卷 分割1(I-4-5-2-1_1_2_003)(外務省外交史料館)。

㉘JACAR(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Ref.B04013034000(第57画像目)、各国共産党関係雑件/中国ノ部/中国共産党員検挙関係 第三卷 分割1(I-4-5-2-1_1_2_003)(外務省外交史料館)。

㉙JACAR(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Ref.B04013033800(第14画像目から第17画像まで)、各国共産党関係雑件/中国ノ部/中国共産党員検挙関係 第二卷 分割3(I-4-5-2-1_1_2_003)(外務省外交史料館)。

2_002)(外務省外交史料館)。

⑤JACAR(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Ref.B04013027700(第28画像目から第41画像まで)、各国共産党関係雑件/中国ノ部/中国共産党員検挙関係 第一巻 分割4(I-4-5-2-1_1_2_001)(外務省外交史料館)。

⑥JACAR(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Ref.B04013027700(第28画像目から第41画像まで)、各国共産党関係雑件/中国ノ部/中国共産党員検挙関係 第一巻 分割4(I-4-5-2-1_1_2_001)(外務省外交史料館)。

⑦JACAR(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Ref.B04013033800(第5画像目から第14画像まで)、各国共産党関係雑件/中国ノ部/中国共産党員検挙関係 第二巻 分割3(I-4-5-2-1_1_2_002)(外務省外交史料館)。

⑧JACAR(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Ref.B04013027700(第28画像目から第41画像まで)、各国共産党関係雑件/中国ノ部/中国共産党員検挙関係 第一巻 分割4(I-4-5-2-1_1_2_001)(外務省外交史料館)。

⑨JACAR(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Ref.B04013033800(第16画像目から第17画像目まで)、各国共産党関係雑件/中国ノ部/中国共産党員検挙関係 第二巻 分割3(I-4-5-2-1_1_2_002)(外務省外交史料館)。

⑩JACAR(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Ref.B04013027700(第28画像目から第41画像まで)、各国共産党関係雑件/中国ノ部/中国共産党員検挙関係 第一巻 分割4(I-4-5-2-1_1_2_001)(外務省外交史料館)。

⑪JACAR(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Ref.B04013033800(第18画像目)、各国共産党関係雑件/中国ノ部/中国共産党員検挙関係 第二巻 分割3(I-4-5-2-1_1_2_002)(外務省外交史料館)。

⑫JACAR(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Ref.B04013033800(第19画像目)、各国共産党関係雑件/中国ノ部/中国共産党員検挙関係 第二巻 分割3(I-4-5-2-1_1_2_002)(外務省外交史料館)。

⑬JACAR(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Ref.B04013034100(第35画像目から第36画像まで)、各国共産党関係雑件/中国ノ部/中国共産党員検挙関係 第三巻 分割2(I-4-5-2-1_1_2_003)(外務省外交史料館)。

⑭JACAR(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Ref.B04013034100(第34画像目から第35画像まで)、各国共産党関係雑件/中国ノ部/中国共産党員検挙関係 第三巻 分割2(I-4-5-2-1_1_2_003)(外務省外交史料館)。

⑮JACAR(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Ref.B04013033700(第64画像目から第86画像まで)、各国共産党関係雑件/中国ノ部/中国共産党員検挙関係 第二巻 分割2(I-4-5-2-1_1_2_002)(外務省外交史料館)。

2_002)(外務省外交史料館)。

⑯JACAR(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Ref.B04013033700(第64画像目から第86画像まで)、各国共産党関係雑件/中国ノ部/中国共産党員検挙関係 第二巻 分割2(I-4-5-2-1_1_2_002)(外務省外交史料館)。

⑰JACAR(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Ref.B04013033800(第52画像目から第53画像まで)、各国共産党関係雑件/中国ノ部/中国共産党員検挙関係 第二巻 分割3(I-4-5-2-1_1_2_002)(外務省外交史料館)。

⑱JACAR(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Ref.B04013033700(第64画像目から第86画像まで)、各国共産党関係雑件/中国ノ部/中国共産党員検挙関係 第二巻 分割2(I-4-5-2-1_1_2_002)(外務省外交史料館)。

⑲中国青年艺术同盟是中国留日青年在日本组成的艺术类结社,在相关成员审讯笔录及日方官方往来电报中,名称叫法不一。除“中国青年艺术联盟”外,又称艺术联盟、留日中华艺术同盟、中国留日艺术联盟、中国留日青年艺术同盟、中华艺术联盟等。依据1929年12月9日日本外务省亚细亚局致电日本驻中国各代理公使、驻奉天、上海、青岛、天津、哈尔滨、汉口、广州各领事函电,参考李亚农供词,在文中统一使用“中国青年艺术联盟”这一名称。理由一是日本外务省函电中的调查报告时间较晚,与早期出现的名称相比,较为准确;二是李亚农曾被选为该社负责人,其供词所述名称确信度较高。参见JACAR(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Ref.B04013033700(第50画像目から第51画像まで)、各国共産党関係雑件/中国ノ部/中国共産党員検挙関係 第二巻 分割2(I-4-5-2-1_1_2_002)(外務省外交史料館)。JACAR(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Ref.B04013027700(第14画像目から第74画像まで)、各国共産党関係雑件/中国ノ部/中国共産党員検挙関係 第一巻 分割4(I-4-5-2-1_1_2_002)(外務省外交史料館)。

⑳大久保弘一『赤色支那』、99頁。

㉑大久保弘一『赤色支那』、99頁。

㉒JACAR(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Ref.B04013033800(第5画像目から第14画像まで)、各国共産党関係雑件/中国ノ部/中国共産党員検挙関係 第二巻 分割3(I-4-5-2-1_1_2_002)(外務省外交史料館)。

㉓JACAR(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Ref.B04013034100(第34画像目)、各国共産党関係雑件/中国ノ部/中国共産党員検挙関係 第三巻 分割2(I-4-5-2-1_1_2_003)(外務省外交史料館)。

㉔JACAR(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Ref.B04013033700(第64画像目から第86画像まで)、各国共産党関係雑件/中国ノ部/中国共産党員検挙関係 第二巻 分割2(I-4-5-2-1_1_2_002)(外務省外交史料館)。

⑤JACAR(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Ref.B04013033700(第51画像目)、各国共産党関係雑件/中国ノ部/中国共産党員検挙関係 第二巻 分割2(I-4-5-2-1_1_2_002)(外務省外交史料館)。

⑥JACAR(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Ref.B04013034000(第56画像目)、各国共産党関係雑件/中国ノ部/中国共産党員検挙関係 第三巻 分割1(I-4-5-2-1_1_2_003)(外務省外交史料館)。

⑦参謀本部『支那共産党運動史』、242-246頁。

⑧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编著《抗战英烈谱》，第10頁。

⑨黄鼎臣回忆，社会科学研究社分为甲、乙两组。甲组成员日文基础好、能够读懂读通马列著作，代表成员有廖承志、冯乃超以及东京特支主要负责人郑汉先、童长荣、黄鼎臣等。乙组主要吸纳初到日本、不通日语的人员。见黄鼎臣：《从中共东京特支到反帝大同盟》，《革命史资料》(1)，第27-42頁。

⑩大久保弘一『赤色支那』、99頁。

⑪大久保弘一『赤色支那』、99頁。

⑫黄鼎臣：《从中共东京特支到反帝大同盟》，《革命史资料》(1)，第27-42頁。

⑬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编著《抗战英烈谱》，第10頁。

⑭JACAR(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Ref.B04013033800(第5画像目から第14画像まで)、各国共産党関係雑件/中国ノ部/中国共産党員検挙関係 第二巻 分割3(I-4-5-2-1_1_2_002)(外務省外交史料館)。

⑮JACAR(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Ref.B04013033800(第14画像目から第16画像まで)、各国共産党関係雑件/中国ノ部/中国共産党員検挙関係 第二巻 分割3(I-4-5-2-1_1_2_002)(外務省外交史料館)。

⑯JACAR(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Ref.B04013033800(第50画像目から第52画像まで)、各国共産党関係雑件/中国ノ部/中国共産党員検挙関係 第二巻 分割3(I-4-5-2-1_1_2_002)(外務省外交史料館)。

⑰ACAR(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Ref.B04013033700(第64画像目から第86画像まで)、各国共産党関係雑件/中国ノ部/中国共産党員検挙関係 第二巻 分割2(I-4-5-2-1_1_2_002)(外務省外交史料館)。

⑱JACAR(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Ref.B04013034100(第36画像目から第38画像まで)、各国共産党関係雑件/中国ノ部/中国共産党員検挙関係 第三巻 分割2(I-4-5-2-1_1_2_003)(外務省外交史料館)。

⑲JACAR(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Ref.B04013034100(第36画像目から第38画像まで)、各国共産党関係雑件/中国ノ部/中国共産党員検挙関係 第三巻 分割2(I-4-5-2-1_1_2_003)(外務省外交史料館)。

2_003)(外務省外交史料館)。

⑳JACAR(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Ref.B04013034100(第36画像目から第38画像まで)、各国共産党関係雑件/中国ノ部/中国共産党員検挙関係 第三巻 分割2(I-4-5-2-1_1_2_003)(外務省外交史料館)。

㉑JACAR(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Ref.B04013033700(第64画像目から第86画像まで)、各国共産党関係雑件/中国ノ部/中国共産党員検挙関係 第二巻 分割2(I-4-5-2-1_1_2_002)(外務省外交史料館)。

㉒JACAR(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Ref.B04013033700(第64画像目から第86画像まで)、各国共産党関係雑件/中国ノ部/中国共産党員検挙関係 第二巻 分割2(I-4-5-2-1_1_2_002)(外務省外交史料館)。

㉓JACAR(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Ref.B04013033800(第5画像目から第14画像まで)、各国共産党関係雑件/中国ノ部/中国共産党員検挙関係 第二巻 分割3(I-4-5-2-1_1_2_002)(外務省外交史料館)。

㉔JACAR(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Ref.B04013027700(第28画像目から第41画像まで)、各国共産党関係雑件/中国ノ部/中国共産党員検挙関係 第一巻 分割4(I-4-5-2-1_1_2_001)(外務省外交史料館)。

㉕杨可均，时年20岁，1928年4月到东京，进入早稻田大学政治经济专业学习。

㉖JACAR(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Ref.B04013034100(第34画像目)、各国共産党関係雑件/中国ノ部/中国共産党員検挙関係 第三巻 分割2(I-4-5-2-1_1_2_003)(外務省外交史料館)。

㉗JACAR(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Ref.B04013033800(第54画像目から第85画像まで)、各国共産党関係雑件/中国ノ部/中国共産党員検挙関係 第二巻 分割3(I-4-5-2-1_1_2_002)(外務省外交史料館)。

㉘邹肇思，时年19岁，1929年2月，与党员古颂尧抵神户，造访党员冯曼曼，2月5日，到青光馆。2月8日，进入牛込町成城学校中华学生部，学习日语。9月16日，就读于成城学校高等军政科。

㉙于宣力，时年18岁，1928年9月9日抵达神户，后入东京东亚高等预备学校学习日语。

㉚廖体仁、廖以仁的胞弟。

㉛JACAR(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Ref.B04013035700(第1画像目から第22画像まで)、各国共産党関係雑件/中国ノ部/中国共産党員検挙関係 第六巻 2.其他 分割1(I-4-5-2-1_1_2_006)(外務省外交史料館)。

㉜JACAR(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Ref.B04013033800(第5画像目から第14画像まで)、各国共産党関係雑件/中国

ノ部/中国共産党員検挙関係 第二巻 分割3(I-4-5-2-1_1_2_002)(外務省外交史料館)。

⑫大久保弘一『赤色支那』、99-100頁。

⑬JACAR(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Ref.B04013033800(第5画像目から第14画像まで)、各国共産党関係雑件/中国ノ部/中国共産党員検挙関係 第二巻 分割3(I-4-5-2-1_1_2_002)(外務省外交史料館)。

⑭JACAR(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Ref.B04013033700(第64画像目から第86画像まで)、各国共産党関係雑件/中国ノ部/中国共産党員検挙関係 第二巻 分割2(I-4-5-2-1_1_2_002)(外務省外交史料館)。

⑮JACAR(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Ref.B04013033700(第76画像目)、各国共産党関係雑件/中国ノ部/中国共産党員検挙関係 第二巻 分割2(I-4-5-2-1_1_2_002)(外務省外交史料館)。

⑯JACAR(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Ref.B04013033700(第79画像目)、各国共産党関係雑件/中国ノ部/中国共産党員検挙関係 第二巻 分割2(I-4-5-2-1_1_2_002)(外務省外交史料館)。

⑰JACAR(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Ref.B04013033700(第64画像目から第86画像まで)、各国共産党関係雑件/中国ノ部/中国共産党員検挙関係 第二巻 分割2(I-4-5-2-1_1_2_002)(外務省外交史料館)。

⑱JACAR(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Ref.B04013034000(第57画像目)、各国共産党関係雑件/中国ノ部/中国共産党員検挙関係 第三巻 分割1(I-4-5-2-1_1_2_003)(外務省外交史料館)。

⑲JACAR(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Ref.B04013033700(第64画像目から第86画像まで)、各国共産党関係雑件/中国ノ部/中国共産党員検挙関係 第二巻 分割2(I-4-5-2-1_1_2_002)(外務省外交史料館)。

⑳JACAR(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Ref.B04013033700(第64画像目から第86画像まで)、各国共産党関係雑件/中国ノ部/中国共産党員検挙関係 第二巻 分割2(I-4-5-2-1_1_2_002)(外務省外交史料館)。

㉑王宜田、丁伟《中共党史上的“东京事件”》(《中共党史研究》2009年第4期)一文多处出现日方鉴于中国留日学生斗争经验不足,提议由反帝同盟日本支部、日本劳动组合干部来领导示威运动的描述。而根据史料中李亚农等人的供述,是并汲越次认为日本领导层力量薄弱,急需中方的援助,

并主动申请参加中华留日反帝同盟组织的示威运动,且计划实施时势田泽稻甚至认为日本领导层根本无法指挥,如何行动仍需请示赤色工会国际总部。见JACAR(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Ref.B04013027700、各国共産党関係雑件/中国ノ部/中国共産党員検挙関係 第一巻 分割4(I-4-5-2-1_1_2_002)(外務省外交史料館)。而陈声珩《1929年东京事件与中日交涉》(《民国档案》2014年第1期)缘起部分指出示威运动因日方人员组织准备不足改为9月4日举行。根据史料前后所呈现的内容来看,改为9月4日的原因是多重,如之前“九一游行”的失败、日本政府的阻挠等,且日方准备不足是因等待赤色工会国际总部的指示所致。见JACAR(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Ref.B04013033800、各国共産党関係雑件/中国ノ部/中国共産党員検挙関係 第二巻 分割3(I-4-5-2-1_1_2_002)(外務省外交史料館)。

㉒JACAR(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Ref.B04013033800(第4画像目)、各国共産党関係雑件/中国ノ部/中国共産党員検挙関係 第二巻 分割3(I-4-5-2-1_1_2_002)(外務省外交史料館)。

㉓JACAR(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Ref.B04013033600(第19画像目から第30画像まで)、各国共産党関係雑件/中国ノ部/中国共産党員検挙関係 第二巻 分割1(I-4-5-2-1_1_2_002)(外務省外交史料館)。

㉔JACAR(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Ref.B04013033600(第19画像目から第30画像まで)、各国共産党関係雑件/中国ノ部/中国共産党員検挙関係 第二巻 分割1(I-4-5-2-1_1_2_002)(外務省外交史料館)。

㉕JACAR(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Ref.B04013027700(第28画像目から第41画像まで)、各国共産党関係雑件/中国ノ部/中国共産党員検挙関係 第一巻 分割4(I-4-5-2-1_1_2_001)(外務省外交史料館)。

㉖《中国共产党日本共产党联合告中日两国劳苦民众宣言》,《布尔塞维克》第2卷第5期,1929年3月。

㉗JACAR(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Ref.B04013033700(第64画像目から第86画像まで)、各国共産党関係雑件/中国ノ部/中国共産党員検挙関係 第二巻 分割2(I-4-5-2-1_1_2_002)(外務省外交史料館)。

㉘JACAR(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Ref.B04013035700(第1画像目から第22画像まで)、各国共産党関係雑件/中国ノ部/中国共産党員検挙関係 第六巻2.其他 分割1(I-4-5-2-1_1_2_006)(外務省外交史料館)。